

李鸿宾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三期专门史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中古墓志 胡汉 问题研究

从本书叙述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界定什么是「胡人」，什么是「汉人」了。这种界定的依托就是上述中原农耕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的经济和生态等自然条件制约下人类群体生活习俗形成的差别，以及据此而确立的思想和意识的特殊定型化的状态。



李鸿宾 主编

中古墓志



问题研究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墓志胡汉问题研究 / 李鸿宾主编.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7-05383-5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墓志—研究—中国—中古
②中华民族—古代民族—研究—中古 IV. ①K877.454
②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7695 号

中古墓志胡汉问题研究

李鸿宾 主编

责任编辑 陈 晶 白 雪 何志明

封面设计 项思雨

责任印制 王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6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0727 印 数 1300 册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383-5/K·767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为实现这一目标,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38所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

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中国民族史)专业获得“985工程”三期建设经费的支持,由我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经过反复研讨,我们确立了以科学研究为导向、人才培养为核心,长远规划、分段实施,促进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科学研究为导向就是通过中国民族史的科研活动,引领学科的发展;人才培养为核心就是科研服务于本科生、研究生的发展,通过科研项目培养优秀的民族史专门人才;分段实施,就是持之以恒进行某几个领域的研究,通过“985工程”的连续建设,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为实现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们选择了民族史史料搜集整理研究、国外中国民族史研究动态研究两个学科基础性的研究领域,确定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环境资料整理研究、南方少数民族民间文书调查与研究、国外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动态研究、唐代墓志石刻资料研究四个研究方向。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环境资料整理研究项目由李德龙教授主持,主要是整理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种古籍文献,尤其是边疆各省(区)的地方志,分门别类地从中辑录出各省(区)关于山川、水利、土壤、物产、气候、灾害等自然环境方面的史料。史料的整理对研究边疆地区环境的变迁历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重要资料和历史经验借鉴。

南方少数民族民间文书调查与研究项目由苍铭教授主持,主要是调查与整理南方各族中保存的族谱及契约文书。该项目的意义在于:第一,可为南方

民族历史研究提供重要史料,中国南方有 30 多个世居民族,大多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和文献,民间文书可以弥补民族史研究的史料不足;第二,民间文书记录了各民族与汉族间的经济、文化、血缘的交融过程,对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有重要意义。

国外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动态项目由高翠莲教授主持,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外国学人研究中国民族历史的成果。该项目有助于拓宽中国民族史的学术视野,提高理论水平,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唐代墓志石刻资料研究项目由李鸿宾教授主持,主要是辑录和研究隋唐五代时期非汉民族的墓志和碑铭,结合传世文献对其中若干墓志反映的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进行探索。项目的开展对研究中古时期的民族关系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经过两年的项目建设,我们取得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环境资料丛刊》(云南卷)、四川凉山彝族族谱《俄糯三子——史杰·阿涅·木库世家谱》、《国外中国边疆民族史著译介》、《中古墓志胡汉问题研究》等科研成果,基本实现了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在项目成果付梓出版之际,特书弁言以记识。

苍 铭

2012 年 7 月 5 日

绪 论

李鸿宾

这部集子是由我牵头组织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民族史学科“985工程”建设项目中的子项目“中古时期墓志石刻资料研究——以民族关系为核心”的一个具体成果。作为学校“985工程”的组成部分,我当初申请的目的,就是在项目的支撑下做一些与自己平时关注和研究合拍的工作,而选择墓志中非汉人部分作切入点,具体考察这些进入汉人地区的胡人生活的具体细节性的生活情形,正是我的关注所在,于是,进入项目做研究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我不得不说,以项目作为学术研究有利有弊。利的地方是学校或有关部门提供专项资金用于研究,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学者不必因为经费掣肘而失去必要的支撑。但在规定的期限内,尤其是大大少于研究本身所需时间的限量,那么就势必出现以研究就范于时间的窘境,结果很可能以丧失学术价值或质量不高作为代价,这样,利就可能转而为弊。利弊就在一瞬间,很不容易把握。目前受益于经费资助的研究项目以时段限制学术含量的事例层出不穷,足以证实我的上述说法不虚。怎么做才可以扬利避弊呢?可能每个申请者都在考虑,我的想法则是尽可能照顾双方,尽自己的能力做好调节,如果双方真的必居其一、非此即彼的话,显然,质量的追求是第一位的。我们这个项目同样如此,然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大,那就是多人合作,非同一人那么简单,处理好时限与质量的关系难度更大,何况每个教师还带着若干研究生参与!这本是提高学生学术质量的良好方法,对学生发展有利无弊,但对撰写论文汇编成文集而

言,保障其学术质量的可靠,无疑增加了难度。这实际上是我的担心所在,这也正是设置本项目的一个主要考虑。“985”工程作为高校的一个品牌,成为大陆高校竞相博弈的目标,项目设定的宗旨之一就是培养人才,针对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等,通过具体的研究锻炼以提升他们的学术能力,这是高校自身的使命。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这个小组除了我与本院(历史文化学院)的蒙曼、钟焱、蒋爱花以及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张铭心几位教师外,还将各自指导的若干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吸收进来,共同组成这一课题小组,从2010年年底申请获准,实际工作从2011年开始,组织学生参加相关课程的学习、非汉人墓志资料的收集、参加相关学术研讨会、课下查阅资料、向校外同行取经请益、参加学术讲座、外出调研考察等活动,增强学生学术研究的能力,最终以撰写论文告结。这部集子收录的学生论文,应当就是学生参与课题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上是这部集子的来历和学生参与活动的简单说明。现在就这部集子反映的几个问题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是“民族”的概念问题。

我们这个课题的中心内容就是对中古时期(以唐朝为核心)的墓志中汉人以外群体活动的个案性关照。这些群体作为个人的活动是墓志记载的中心内容。既然是汉人以外的群体,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少数民族”。这是人们习见的,学术界也常采用这个词汇。但从学理的角度讲,这样的称呼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少数民族”是指在现今中国境内的人数少于汉族的其他民族;他们处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后者有明确的疆域实质和观(概)念;民族成员作为国家的公民而具有法律规范的权益和享有的义务;国家具有明确的主权并受国内国际法的保护等。这些要素之下的民族才具备人数上少于多数的“少数民族”的特性。民族国家之前的王朝时代与此有很大的差别,在它治下同样分布有各个民族,但因为王朝由核心区 and 外围区构建并存在着核心区的主体民族与外围区非主体民族的差异,二者并不等同,不具备民族—国家范畴内“少数民族”的基本特性,所以我们主张应将二者加以区隔,这样做似

乎更能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相貌。这也就涉及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基本特性:它是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若采用进化论的学说,历史有一个发生、发展与变迁的过程,其目标是走向未来,这样的过程就是历时性的变迁。套用研究者所在时代的概念或观念去解释与他(她)相隔悬远时代的景象,这方法常常为我们所用^①,但要有明确的指向,否则就会古今混谈,脱离历史相貌。“少数民族”这个词尤其典型,学术界不加分辨采用此词的唯一动机就是“不加考虑”,缺少精准性,结果就是用今人的观念去解释跟现在不一样的过去,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按照我的想法,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当时的中性称谓描述过去的对象,譬如“突厥(人)”“回鹘(人)”“吐蕃(人)”等,“胡人”则是一个集体称谓,专门指向西域地区体貌特征明显的民族,在唐朝尤其指向来自中亚阿姆河、锡尔河地区操东伊朗语言的粟特人。关于这些,我曾发表过专文论述,此不赘言。^②顺便一说,我的这个想法只是就我写作时采用,本集子收录的其他论文如何使用“民族”说法,作为主编,我并没有作硬性规定,既然是学术作品,研究者自身对这个概念应当有自己的界定,“全体统一”在教科书或者“定性”的作品里采用固然有其约束,在论文集里反映作者本人的想法可能会更有助于讨论,有鉴于此,我这里谈论的是我的想法,并不代表同书的其他作者。读者将会看到,我们对“民族”概念的把握,将会出现差别。

其次是“王朝国家”的概念及其二元制的建构。^③

我之所以将“少数民族”与历史上的民族称谓加以区别,还是由这两个称谓的性质决定的。如上所述,“少数民族”概念是建立在公民身份、政治平等、疆

①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99页。

②参见拙文:《“胡人”抑或“少数民族”?——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的解说》,《乾陵文化研究》(四),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0~28页;又收入拙著《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3~99页。

③参见拙文:《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从长城谈起》,《民族史研究》第7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61~79页;《传统与近代的对接——从地域和民族角度论述中国传统王朝的近代境遇》,《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57页;《“二元制构造”下的唐朝华夷观及其变化》,《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8~128页;《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5~175页。

域明确的主权国家范畴内,与此对应,本书出现的各个民族则是在王朝国家的语境下活动的。什么是“王朝国家”呢?就是由一个政治核心的统治集团依据一个特定地区作为控制的核心区域,对它所控制的范围进行治理的政权形式。^①这样的王朝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在地域上分成核心区和外围区两个层次。核心区就是统治集团治理国家的基本范围,周边外围地区则拱卫核心区,二者地位在统治集团眼中并非均等,而是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从而形成了王朝国家地域的二元结构。对隋唐王朝而言,中原就是自古以来的核心区,中原的周边则是外围区,这种建构始于秦,汉朝巩固,后代继承,隋唐接续。其二是统治下的民众同样有主体与非主体的区隔。这种区隔与地域内外的划分呈对等态势,但并非因果关联。事实上,倒是后者决定了前者,因为地域是为人活动提供的空间,其价值取决于活动者自身。隋唐王朝的建立者有自己的核心集团,即如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隋唐以此起家并主宰全国的过程,就是关陇集团从地区性的政治体走向全国政治体的衍变过程。隋唐控制下的主体民众是中原的汉人,是毫无疑问的。隋朝特别是唐朝向周边的扩展所裹挟的非汉人群体,则是王朝扩大后新加入的民族,与汉人的主流群体有明显的差别,他们多分布在中原核心区的四周^②,于是,汉人主体与非汉人非主体的格局与地域之间就形成了对应关系。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这种二元制的建构呢?

二元制建构的中心在于“核心”与“外围”的非均等性,前者是建构的关键,

^①对此进行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可参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19页;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308~320页;毛汉光:《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同氏著:《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王德权:《“核心集团核心区”理论的检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25期,2006年,第147~176页。

^②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按该书的篇幅设计,除第一章为背景介绍、第十三章为其他迁移外,第二至第六章分别叙述周边民族的内迁,与此对应,第七至第十二章则是汉人向周边的迁徙。他的这个设计,正好展现了内地、周边这种二元制的套路,虽然此书的本意是研究移民,并不讨论内外结构,但支配作者描述迁移的基本思路,显然是内外二元制格局的叙事构造。可见,这个思路已经成为“古代中国”叙事的基本架构了。

后者依托于前者。这个体制的特征就在于以自我为中心进而构建成为一个特定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中原农耕地区是核心,种植业与定居生活为主体方式,儒家学说成为王朝的支配思想和意识形态。这样的认识在早期的汉文史籍中就不断地重复出现,所谓九州、四海、天下与华夏—戎狄蛮夷五方格局的话语,成为支配中原王朝立国的理论基础。^①在这个中心范围内,中原无疑具有突出的地位,而其地位的获得,最根本的还是活动于其上的汉人群体,上述定居生活方式、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是由活动在中心地区的汉人群体呈现出来的。与此对应,中原的周边则是农耕以外的半农半牧和游牧、渔猎及其相适应的非汉人群体,这些群体以外的则属性质差异明显的远域外国。这种格局也被学者们视作宗藩体制或朝贡体系加以概括,成为人们观察古典中国王朝的基本特质而影响于学界内外^②,亦成为当下讨论这个古代王朝的一个尺度。不只如此,以中原为核心的体系也导致了以自我为中心叙述的话语系统,这同样支配了各个朝代的政治精英和民众,从司马迁的《史记》到《清史稿》的编纂,在叙述周边四夷的章节里,莫不如此。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并非存在于特定的地区,而具有相当普遍性。诚如刘易士、魏根所说,除欧洲有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外,在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地区、南亚、中国等同样有自我中心的界定。^③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中心区就是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从大陆的东部大兴安岭到中亚和南欧,草原、山地的自然生态的相似,使活动在这个广阔地域内的群体也具有相近的生活样态:追逐水草丰美的游牧族群。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所谓游牧社会并非单纯的游牧本身,其内部有诸多生计的分化^④,但与农耕社会相比,其特

①参阅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同氏编:《永恒的巨流——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433~478页;葛兆光:《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九州》第4辑(中国地理学专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9~132页。

②对朝贡、宗藩关系概括影响卓著的首推费正清,参看他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③(美)马丁·刘易士、卡伦·魏根:《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杨瑾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5~56页。

④Jürgen Paul, Halle, The States and the Military – a Nomadic Perspective, *Orientwissenschaftliche Hefte*, No. 12, 2003, pp.25~68;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

征则很鲜明并具有同一性的。草原自我中心的观念同样存在于草原内部,并成为他们统辖自身和其他世界的意识形态。^①

东亚世界北部草原自成一统的中心,与南部的中原核心区正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种情形与长城南北广阔的耕地和草原有直接关系。中原地域的辽阔,使得农耕王朝开拓的空间可以延展到农耕的边缘,甚至扩展到耕地以外的地区,中原王朝正是通过拓展农耕地域的方式实现扩张。农耕与草原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生态的差异,当农耕发展的同时,草原也出现了自身中心区,匈奴帝国就是历史上第一次草原政治体的浮现。^②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主要就表现在南北两大政治体的碰撞与接触、冲突与融合的互动关系上,这种局面与亚洲西部和地中海周围农业帝国与北方游牧政权的对应相互辉映。在本书撰写的时代范围内,南部中原王朝的势力第一次突破长城地域,开始拓向北方的草原,以东突厥覆灭为标志,构成了长城南北的一体化。^③这既是此前中原王朝强盛时期的统治诉求的真正实现,但也仅是昙花一现。唐朝以后南北的再度统

①参见 Larry W. Moses, *T'ang Tribute Relations with the Inner Asian Barbarian*, Edited by John Curtic Perry and Bardwell L. Smith, *Essays on T'ang Society: the Interplay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E. J. Brill, Leiden, 1976, pp. 61~89; (俄)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文明的交汇:公元250年至750年》,马小鹤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367页。

②参见(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95~246页;王明珂前揭书,第101~156页。

③就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古时代而言,从人群及其组成的政治体(王朝国家)角度观察,大体上呈现南北的交往与互动。这是因为那个时代聚集于政权下的族群集中展现在中原和北方草原两处环境迥然有别的地域内。当东汉王朝解体后,中原势力分裂割据,受中原政治影响而走上王朝道路的族群更多地来源于北方,他们南下后也纷纷在中原建立王朝,进而衍生出统辖全国的隋和跨越长城南北的唐。唐向西域开拓所形成的东西交往实际是要解决南北的问题,以东突厥降附为标志的唐朝统辖长城南北,凸显了这种关系的性质,即农耕与游牧的联系。突厥复兴后对唐的骚扰导致节度使防边格局的形成,以及后期王朝管辖的萎缩、地方势力的抬头,直至晚唐朝廷的不振和边地势力的崛起……这一切事变的背后,隐藏的都是南北关系这根主轴。即使有青藏高原吐蕃兴起引生唐蕃关系的跌宕、南诏北上招致唐朝的防阻,这些事变甚至成为朝廷头疼不已的烦恼,亦未曾突破南北的羁制。看来,理解唐朝核心关系的根本之处,南北的互动可能超越其他方向的联系而居首位,且此种关系终至于清,延续了整个古典时代。

合,就不是出自中原的愿望而是北方草原的游牧人统辖了,蒙古和满族贵族集团完成了这一夙愿。就此而言,唐朝的中心观显然是建立在传统中原核心区的基础上并再度拓展了这个观念。由此也构建了本书论述的主旨,即本书涉及的胡人汉化就是依托于中原核心区,反映的是中心区以外的群体和个人进入华夏儒家文化的地区内承受文化的转型和心理认同变迁的问题。如果农耕地区的汉人进入草原的游牧世界,就会表现出相反的境况,那就是汉人如何胡化了。汉化、胡化之产生,前提就是进入到哪个核心区或以哪个区域的文化为主导。

另外,何谓“胡人汉化”?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界定什么是“胡人”,什么是“汉人”了。这种界定依托于中原农耕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的经济和生态等自然条件制约下人类群体生活习俗形成的差别,以及据此而确立的思想和意识的特殊定型化的状态。中原农业社会人群的“男耕女织”与长城以北游牧人的“逐水草而迁”,非常鲜明地展现了生活形态迥异场景下人们行为的差异。在各自环境下适应主流生活方式群体的行为和意识,就成为这种社会中的主体,汉人在中原与游牧人在草原,分别是各自社会的主流群体,然而一旦彼此走向对方且成为人数上的弱者,就被视为外来者,这些少数外来者面对的是主流社会的、与己方文化迥然有别的主体文化,于是,他们的文化选择就成为问题而提上了日程。如上所述,在“中国”的语境下,南北均出现并衍生出各自为中心的文明区,南部农耕文化的华夏文明区至少在夏商周就已进入到国家的成熟状态,北部草原游牧社会走向一体化的王朝帝国阶段,相对晚至西历纪元前的1~2世纪。然而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一旦自身文明圈形成之后,外部势力(集体或个人)介入,他们原来的文化属性与周遭文化交织、混同,就成为突出的问题摆在进入者的面前。从汉文化中心的角度讲,外来的非汉人一旦步入汉地文化圈,他们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采用“胡人汉化”的意思就是如此。

也如前面所说,唐朝是第一个兼统长城北部地区的中原王朝。此前的一统化朝代,从秦朝算起,统辖的范围北上扩展至鄂尔多斯高原,但大体上维持在农耕区的北缘,为维护农耕区,它采取修筑长城的办法阻隔北部草原的游牧势力;汉代到武帝时开始突破了秦朝的防线,进一步北上采取攻势,然而长城北部地区并未纳入汉朝的行政管辖范围。唐朝从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剪灭东突

厥势力之后,北部草原铁勒系统诸部尊奉太宗为天可汗的举措,正式标志长城北部同属于中原王朝之下。^①

唐朝之所以能够兼统长城南北,学术界有不同的讨论,不可否认的是,唐朝的统治集团与北方势力有密切的关系,采用陈寅恪的说法就是李唐皇室母系成员多有鲜卑血统^②,以致有唐朝源流出于夷狄的极端说法^③,此说虽已淹没,至少唐朝北系的观念仍存,谷川道雄认为唐朝帝国的血脉直接秉承后魏以降的北朝系统^④,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人所接受。易言之,唐朝之涉入长城以北的草原,与它北朝起家的传统关联密切。^⑤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朝统辖的南北,并非贯穿始终,只能说持续了一段时间,大体上从太宗征服东突厥、高宗降服西突厥开始,到玄宗朝安史反叛之前,前后不过百十年间。安史之乱以后,朝廷的主要精力便耗费在周旋于地方节度使势力的扩大及其产生的与朝廷抗衡、中央对地方控制企图的重现的挣扎中。即使在朝廷控制草原的百多年里,也并非前后一致,而是它的控制力随着太宗、高宗及武则天权位更变而逐渐递减,特别是高宗调露时期(679~680年)突厥汗国的复辟,极大地制约了朝廷对草原的统辖。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突厥帝国的复辟,就意味着唐朝全面统辖北部草原时代的结束。

然而在涉及非汉人进入汉人的生活圈之内,胡人汉化的问题一直存在便毫无疑问了。我的问题是,在具体涉及所谓胡人汉化时这样的背景变迁,是我

①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7~214页;朱振宏:《隋唐与东突厥互动关系之研究》,嘉义:中正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5年,第282~299页。

②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

③参见(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6《历代三》,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45页。

④参见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⑤这就是陈寅恪概括的隋唐统治集团主要源自的“关陇集团”,参见氏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5~19页。毛汉光的《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1~28页)对陈寅恪的关陇集团做进一步的伸张。张伟国的《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则是就关陇集团成员的来源、构成及其与唐政权的奠基者北周、隋朝之关系做的延伸性研究。无论二者如何发挥,唐朝统治集团的北方系统则是其伸张的基础。

们讨论得较少甚至被忽略的。虽然作为个体或集体进入中原的这些外来者处于弱势的地位,他们面临文化转型或转往汉文化的方向毫无疑问,但唐朝控制草原与否所映现的强力趋势与弱势导致朝廷对待胡人政策有别的事实,则不能轻易忽略。易言之,以安史之乱为分期的唐朝社会在对待胡人的观念上实际是有前后期差别的。前期视胡人为唐朝社会的一个层面而予以宽容接受,后期则视他们为异类而排斥。^①这个排斥直接源自安史之乱为首者的胡人系统,至少在抱持中原正统文化的那些人眼中,他们就是动荡不已的异己分子。这种内地衍生的汉人对胡人的情感排斥,就是胡人自身属性的认同走向隐蔽甚至被迫放弃的现实因缘。^②前后期朝廷政策的强烈反差,这样的环境对具体的胡人汉化问题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我们应当予以把握。

与此相关并引起我们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辨别唐朝出现的“胡人汉化”现象?上文已经清楚地说明,胡人汉化是建立在中原文化核心圈的基础上,这套话语权掌握在中原(群体和个人)手里,而支配胡汉的观念就是起源甚早且绵延相传的所谓“夷夏观”,即使唐太宗强调夷狄为常人的观念超越了传统的藩篱,但夷夏有别的思想始终支配着他和他观念相近的朝臣^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从后来的大一统王朝的事例反衬唐朝的胡汉问题,特别是美国新清史研究的角度,可以看出作为传统王朝的唐朝和作为外来者入关后构建的一统化帝国的清朝,二者的族属与文化属性存在着所谓正统与非正统性差异,因此在处理胡汉关系上有诸多值得我们挖掘和研究的空间。诚如《新清帝国史》所说,清廷的异族背景,使得它入主中原后能够超越传统的夷夏观,将自己打扮成天下共主,从而有能力解决此前王朝未能解决的南北问题,将长城内外融为一体。^④从这个角度看,唐朝无论在盛时还是弱时,都没有

①参见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此据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209~226、339~383页。

②参见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2~123页。

③参见潘蛟:《“民族”的舶来及相关问题的争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第29~30页。

④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Philippe Forê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Routledge, 2004, Introduction, pp. 2~4.

突破“夷夏”的框架。换句话说,作为一统化的朝廷,唐朝统治集团合法化的“正统性”地位,并没有像满族贵族入主中原之后面临的“合法性”地位那样遭受质疑,因为唐廷来源的“关陇集团”本身,就是当时社会环境内的中原认可的政治集团,虽然有北方胡人源流的成分,但北方的文化南下对中原的冲击早已消解了“夷夏之辨”的界度,更确切地说,关陇集团自身亦是中原文化的产物。这一点与来自中原以外的满族贵族集团,在文化和观念上有本质的差别。然而,无论唐朝的合法性还是清朝合法性的再确立,这套“合法性”“正统性”的观念和话语,都是建立在中原中心圈的架构之上,倘若不是如此,合法性的基础就不会是中原,而是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因此,建基于中原框架之上的系统,强调的自然中原的立场,这就是我们研究唐朝时代“胡人汉化”背后隐藏的一个逻辑话语,需要自我警醒。

目 录

魏晋南北朝篇

- 魏晋南北朝隋唐斛斯氏家族研究 谢 琛 3
- 《封和突墓志》渊源考 郭月琼 23
- 试论高昌国楷书形态的演变及特点
——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 李 笋 34
- 北魏赵郡李氏的人和事
——读《李宪墓志》 叶其峰 67
- 萨保研究综述及对几条材料的思考 王 东 82

隋唐篇

由武人文

- 从墓志看长孙氏家族在隋唐时代的发展历程 马 静 105
- 唐贺拔亮张氏联姻反映的文化认同与士族相貌
——以《唐贺拔君夫人张氏墓志》为中心 李鸿宾 130
- 唐代契苾何力家族籍贯变迁 张文燕 146
- 唐代《裴沙墓志》所反映的西域胡人的汉化及认同 裴恒涛 158
- 读《契苾明碑》札记 王 苗 194
- 唐《窦思仁墓志》研究：以“先天政变”为中心 张 明 207
- 唐《裴昇墓志铭》初考 付 珺 229
- 羁旅唐朝的新罗王族
——《金日晟墓志》初探 杨思奇 240

唐《陈守礼墓志》考释及相关问题研究	蓝贤明	279
唐《石默啜墓志》考释	尤 李	298
《石神福墓志》考释	高文文	309
吾宗女士		
——唐代出嫁女墓志中娘家人的书写	蒙 曼	321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曹怀直(元秀)墓志铭考释	蒋爱花	337
唐以后篇		
从“海内汗”到转轮王		
——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中的元朝		
皇帝称銜考释	钟 烺	351
云南地区冠形圆首碑源流考	李 榆	364
后 记		375